

SHANG DING ZHU

尚丁著

芳草斜阳忆行踪

伟人、师长、朋友的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尚 丁 著

芳草斜阳忆行踪

伟人、师长、朋友的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盛青

封面设计：官超

芳草斜阳忆行踪

——伟人、师长、朋友的故事

尚丁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字数220,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1551-8/I·1236 定价：13.00元

序

贾植芳

老友尚丁兄将他近些年写的生活回忆性的文字，编选成册，起名为《芳草斜阳忆行踪——伟人、师长、朋友的故事》，交付出版，并约我为它写一篇序文。我虽然已是今年逾八旬，最近又生过一场大病的老朽了，但当我捧读了全书的目录和部分章节后，慨然相允。这不但因为我们是相交已半个多世纪，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与追求，也有着相近似的历史遭遇与生活命运，都是饱经世变，历尽沧桑的老友，更因为这是一部内容无比丰富的人生记录，是一部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生活档案，我应义不容辞地为它走向读者社会摇旗呐喊，这是一种庄严的社会责任。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前些年写的谈老年的文章中的一个心愿式倡议。我说：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总处于历史震荡的变幻之中,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吃文化饭的知识分子,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震荡中,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内容与形式的生命之路。因此我常这么想,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说来,实在是功莫大焉。因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吃文化饭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动荡不宁的中国社会生活里,由于生活的责任感和实际的处世存身的需要,一般总富于生活的敏感与时代激情,处身在生活的前沿地带,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兴亡,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折射和反映;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见之正史、官书中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见《文化老人话人生》,范泉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而眼下尚丁兄写的这部回忆录书稿,可谓正中下怀,与鄙见不谋而合,这真是老话说的“英雄所见略同”或曰“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我感到高兴,得到慰藉。这一点,也可说是我不顾自己年迈体衰,还要拼一记,下决心写这篇称为序的小文的又一个缘由。

尚丁兄早在四十年代初即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与了

中国知识界抗击国民党的腐朽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参与了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实际政治斗争和文化出版活动,当时他追随中国民主政团的发起人黄炎培先生,并以此为机缘,结识了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文化精英,而且以此为起始,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一直为中国民主建设事业而奋斗,因此,他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同时勤学苦练,博览群书,自强不息。这部回忆录以单篇形式逐一记录了他生平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与事,记录了他的所见与所闻,也记录了他的人生追求与生活历程。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原本就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了解人、体味人的思想与性格,才学人品与他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精神追求,才会正确地认识历史,把握生活脉搏,体味时代精神,历史走向。从这个意义来说,尚丁兄这部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依据,而又在历经劫难后在生命的暮年所撰写的这部以现代史上的历史人物为主体的新作,不但使人眼界洞开,增广见闻,而且对于把握历史,认识社会,品味人生,都是大有裨益的读物,更何况它所提供的大量富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史料,足以补充流行的历史教材的缺失与不足,并有助于人们走出空洞抽象以至虚妄的历史概念,走向历史实际,获得对历史的理性判断力量呢?因为这部书稿中所接触的人物,大都是政治风云人物与社会各界名流和文化精英,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陈嘉庚,史量才,章乃器,李公仆,马寅初,郭沫若,茅盾,叶圣陶,丰子恺等等。书中具体地描绘了他们的言行举止,人品才学,功业文章,性情与

交游。如书中所记黄炎培四十年代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窑洞对”,就是罕见的历史史料,至今读来,仍然发人深思,为研读中国现当代史提供了一个基本视角与论点。

这就是我读了尚丁兄这部新著的全书目录和部分章节后的一点感想与认识。

我与尚丁结识于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那时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血性青年。那时他仍在黄炎培先生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并且是民主同盟的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又先后主持《国讯》、《展望》两种进步刊物的工作,我则是在日寇投降后,走出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课监狱,来上海卖文为生的文坛上散兵游勇,在那个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前夕,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以他所供职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地,我们自发地纠集了二三十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组成“我们的俱乐部”这个小团体,每周举行座谈,评论时政,关心国事,注视文化出版局势,当1947年进步刊物《文萃》被查封后,为了填补进步舆论阵地的空白,我们自掏腰包,集资创办《诗与杂文》丛刊,借用《国讯》的出版关系,由国光印刷厂印行,又利用《国讯》的发行渠道上市,为了逃避文祸,托名编辑出版地点为香港。但出版了第一期《犯罪的功劳》,在第二期结稿后,1947年秋,因我在非法报纸上写文支持学生们的民主运动,我们夫妇双双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以煽动学潮罪逮捕关押,这是我第二次吃这个反人民政权的政治官司,朋友们为了避祸,这个小刊物就无疾而终了。我的妻子先我出狱后,尚丁兄为了照顾她的生

计,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关系,为她安排了个小学教师的职业,虽然不旋踵,校方查出她为我的妻子而又被解聘,但事后我对尚丁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热情相助的侠行义举,感激之余,对他的为人道德,又多了一层认识与敬重。1948年深秋我出狱后蛰居西郊乡间,又承尚丁兄大力相助,他借用黄炎培先生所创办的鸿英图书馆的收藏,先为我编集自己的散文集《热力》提供有关报刊,又为我撰写《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一书搜求有关史料与专著,这样直到1949年初春,我们夫妇又被迫离沪走避青岛。他这种屡次在患难中相助的深情厚谊,至今想来,犹使我激动不已,古语所谓“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又多了一重新的生动的历史例证。

1949年秋上海解放后,我们夫妇又卷土重来回到了上海,我们又快乐地见面了。他仍担任《展望》社总编,同时,作为民主同盟的主要成员,他又忙于参政议政活动。我则转入高等学校任教,大家都心情舒畅地忙碌着,见面聚谈的机会反而显得少有了,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为了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大家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似的,都想多干点什么才过瘾。因为我们多年的理想与追求,总算变成了生活的现实,我们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天大的喜事。但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当时还不懂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名言的深刻内涵和它的严重意义。五十年代初,随着对《武训传》和一些文艺作品的政治性批判,极左思潮和观点逐渐抬头,发展直至1955年的胡风事件的发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我们夫妇

就受到株连，被扫地出门，收监关押。真是长夜漫漫，经过二十多年的天路历程式的关押劳役生涯，直到八十年代前后我们重新回到社会，夫妇得以团聚后，才又与尚丁兄重新聚首，这时，我们都是六十开外的白发翁了。此后我才逐渐知道 1955 年胡风案件发生时，他因为在主持《展望》时邀请后来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王元化、耿庸参与负责编辑工作，再加上和我们夫妇的那段“历史关系”，也被收监关押了一年多，不旋踵又当了“五七战士”，被流放青海牧区战天斗地，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同样曾流放青海的老妻任敏结下了一段“寄籍”乡缘，“历史关系”又加深了一层。虽然前此 1956 年出狱后，他曾被宣布恢复政治名誉，并被任命为新知识出版社和古典文学出版社（即现在的古籍出版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进而创办了《学术月刊》。1962 年从青海回到上海后，再被安排到辞海编辑所，和一些也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并被打入另册的文化名人，如徐铸成、傅东华、曾彦修等被任命为“编审”，实际上是在资料室做管理图书、整理资料的工作，一如我在 1978 年秋被“解除监督”回到原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坐班干的活一样。而后“文革”中他又入了“牛棚”，不断受到批斗与凌辱。直到 1979 年才得到平反，由鬼变成了人，复职后创办了《辞书研究》，筹划成立了“上海辞书学会”与“中国年鉴研究会”两个学术团体，并连任三届会长。从 1979 年起，他还当了二十年市政协常委并兼任了民盟市委副主委和中央委员，在公务繁忙之余，不顾年迈体衰，仍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传记作品《黄炎

培》以及根据自己五十年代后期流放青海时期的生活体验与感受创作的诗剧《仓央嘉措》等等。

现在又读了尚丁兄这本新著中的某些篇章之后，不仅使我对老友的生命历程与人生体验多了一层认识与理解，更使我激动的，是他在屡遭磨难之后还能荣辱不惊执著如一的精神境界与生命追求。

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知难而进的韧性品格，他们的可贵之处是在季节转换，深陷绝境之后，并未沉湎于消沉麻木与怨尤逃避的无为，或无所不为的历史泥淖之中，而是仍然能以昂奋之姿，肩负起历史与时代所赋予的重任，忧国忧民，埋首工作，“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为了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蹒跚前进，发挥自己的余光与余热，诚如“文革”中流行的一句名言所形容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读尚丁兄的书稿，使我对这种说法又多了一层新的认识与感受。

为了有助于读者读其书而知其人，我又不惜笔墨就我所知与所见地介绍了尚丁兄的人生经历与精神人品，因为“文如其人”，文格就是作家人格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态和精神境界。

俗话说，“秀才人情半张纸”，信笔写了这么一堆话，就权作为我与尚丁兄半个多世纪以来风雨同舟的友情的一点纪念，留在纸上吧。

是为序。

1997年4月末， 在上海寓所。

目 录

序	贾植芳
---------	-----

卷一 伟人们的交往录

千秋“窑洞对”(毛泽东与黄炎培)	3
因缘·知音·诤友(周恩来与黄炎培)	16
诗笔传韵事(陈毅元帅与黄炎培)	31
“犹是张园隔枣岚”(黄炎培与沈钧儒)	38
“毁家集美尊陈叟”(黄炎培与陈嘉庚)	48
“白日陈尸帝不知”(黄炎培与史量才)	54
风雨泪桐花(黄炎培与于右任)	59

卷二 师长·朋友的故事

难忘的教诲(怀沈钧儒先生)	67
芳草萋萋 往事依依(回忆郭沫若先生)	74
胸藏万汇,笔有千钧(回忆茅盾先生)	86
正其谊 明其道(回忆马寅初先生)	96
“与哲学无缘”的哲学家(梁漱溟先生轶事)	115
孺子牛与“厌世家”(记叶圣陶先生)	126
他“打到方块字”(怀胡愈之先生)	144

137585

1

“太白”之谜(访陈望道先生)·····	152
白发黄鸡(怀丰子恺先生)·····	163
不怕坐牢的女律师(怀史良大姐)·····	170
抱着孩子的殉道者(回忆李公朴先生)·····	179
破灭的梦(章乃器在重庆)·····	191
《非孝》风波(施复亮轶事)·····	204
“十九筹好汉”(张志让先生二三事)·····	218
“人民的哲学家”(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	237
一代报人(怀徐铸成先生)·····	250
“新闻界的释迦牟尼”(回忆俞颂华先生)·····	258
“不为物喜,不为己忧”(石西民同志二三事)·····	266
“青春办报,皓首出书”(陈翰伯同志二三事)·····	274
三十年华人称“老”(怀杨卫玉先生)·····	283
“拒检运动”的策划人(黄洛峰同志二三事)·····	289
他和胡适称兄道弟(汪原放先生二三事)·····	299
“三年牛挤乳,一夕海扬波”(邹韬奋在重庆)·····	311
遗札三复待春归(缅怀程应缪教授)·····	322

卷三 黄炎培轶事

青少年时代·····	333
婚姻家庭·····	336
三次遇险记·····	340
肝胆两同盟·····	349
做寿和卖字·····	356

卷 一

伟人们的交往录

千秋“窑洞对”

——毛泽东与黄炎培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飞机于上午9时35分起飞，下午1时半平安到达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到机场欢迎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三十来人，一一握手致意。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道：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盛赞毛泽东好记性。黄炎培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和黄炎培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交往的。

到了延安，黄炎培觉得样样都很新鲜。晚上他在雪一

样白的窗月下，在床上朦胧中吟成七律一首：

延 安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白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
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

这是一首感时纪事的诗，诗人借宋范仲淹的故事，抒发了初到延安的感受。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六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就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住所。当中有一所规模较宏伟的大会堂，靠山面阳。他们从大会堂的右边步上山坡，绕到后面，便是毛泽东接待客人的会客室，似乎就是大会堂的后身上层。会客室呈长方形，光线充足，中间是一张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二十人。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画是 1943 年当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出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料不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当黄炎培在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时,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了他周身,使他完全敞开了心扉,在三天中和毛泽东促膝长谈达十几个小时,造成了他自认为一生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

他在延安的五天当中,会晤了许多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还对他执弟子礼。当然,他们一行访问延安,主要是为国共团结谈判问题。但在黄炎培,却是一次对他的晚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留学”。而毛泽东和黄炎培这两位政治家和诗人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

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专程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谈了整顿三风的运动,说从多年的革命实践中,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就错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他们还探讨了教育学说上的看法。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